

普列汉诺夫著

工团主义和 社会主义

王荫庭译

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

〔俄〕普列汉诺夫著

王荫庭译

人 民 出 版 社

Г.В.ПЛЕХАНОВ
Сочинения, Т. XVI.
Госиздат, 1925.

本书选译自《普列汉诺夫选集》第十六卷，
苏联“国家出版社”1925年俄文版

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

Gongtuanzhuyi he Shehuizhuyi

〔俄〕普列汉诺夫著

王荫庭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29,000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1·1934 定价 0.64元

目 录

对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	1
作者的话	1
第一篇文章：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 （载《现代世界》一九〇七年第十一——十二期）	2
第二篇文章：恩利科·列昂奈和伊万诺埃·波诺米 （载《现代世界》一九〇八年第二——四期）	69
评亚·奥·奥里威蒂的书 （载《现代世界》一九〇八年第八期）	142
维·切尔诺夫先生和波尔·路易 （载《现代世界》一九〇八年第八期）	149
评恩·克里茨卡亚和恩·列别节夫的书 （载《现代世界》一九〇八年第十期）	156
答总罢工调查表 （摘自拉葛德尔先生《总罢工和社会主义》一书）	164
译者后记	166

对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

作者的话^①

我的朋友和同志、安杰利卡·巴拉班诺娃博士希望将我评阿尔图拉·拉布里奥拉和恩利科·列昂奈这两位意大利工团主义者的文章翻译成意大利文。

假如我对工团主义的批判得到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赞同，那我是极为高兴的。工团主义在工人头脑中确实造成了不少混乱，现在该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开始同这种学说进行理论斗争的时候了。我们那些把工团主义看成社会主义一种形式的同志，是大错特错了。其实真正的工团主义，即彻头彻尾的工团主义，跟真正的社会主义，即跟同样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我确信，经验和思考会使至今仍持相反观点的人也相信这一点。

我的这些文章的第一篇在俄文杂志《现代世界》上登出来以后，阿·拉布里奥拉先生便大发雷霆；他在《*Pagine Libere*》^②和法文杂志《*Mouvement Socialiste*》^③上对我宣泄怒火。

我至今还没有给他答复，原因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文章里，谩骂比论据多得多。而我呢，虽说这辈子论战不少，可没有回答谩骂的习惯。在这种场合，我是倾向于老习惯的。况且诽谤

① 评阿·拉布里奥拉和恩·列昂奈的两篇文章的意大利文译本序。

② 《自由的篇章》。——译者注

③ 《社会主义运动》。——译者注

过国际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和国际工人协会奠基者的人。他的攻击不可能对我有什么损害；这些谩骂或许甚至还会使我心怀开畅，要是骂得较有艺术的话。等我写完这一组评论工团主义的文章^①，我会着手对我的论敌们为保卫工团主义而提出的种种反驳作一番系统性的分析的。不过我之注意阿·拉布里奥拉先生，只是因为他那些反对我的论文中有些论据，而不是仅仅几句陈词滥调。

暂时我只好忍耐忍耐拉布里奥拉先生的怒气，这对我——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第一篇文章

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

阿·拉布里奥拉：《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附作者给俄文版写的序言。格·基尔德错夫译自意大利文，安·卢那察尔斯基编辑并附有他的跋文。“野蔷薇”出版社。圣彼得堡 1907 年。

常言说得好：任何序同时也就是跋。不过恐怕也有同样的理由可以断言：任何跋都可看成是序。无论如何，对安·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给他编辑的格·基尔德错夫先生翻译的阿·拉布里奥拉的《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一书写的那篇跋文，是可以这样说的。尤其是，如果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把自己的跋叫做序，并且把它放在拉布里奥拉著作的前面，他就做得更好了，那时它就会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即把读这本书所必需的若干指导性的意见告诉读者。

① 下面刊登的两篇评意大利工团主义者的文章只是这一组文章的开始。

不过，我说得不完全确切。我说的是：“就会更好地完成”，而本来应当说：“就不会那么坏地完成”等等，因为事实上，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的跋文在完成上述任务方面是非常糟糕的。

说糟糕，第一是因为这篇跋文对一般工团主义作了不正确的说明。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说：“同改良主义斗争，今天在西方，是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明天在我们这里也会是这样。既然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们在磨快对改良主义者进行批判的武器，他们就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就连认为工团主义是一种极端的那些正统社会民主党人，也仍然承认它是对企图使社会民主党变成单纯的极端的左翼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种健康的反动”（第247页）。说同改良主义作斗争是西方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究竟有谁认为工团主义是对改良主义的“健康的”反动呢？我不知道。而且能不能认为工团主义是健康的反动呢？最后，一般说来，“健康的反动”是什么意思呢？力学说：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在人类思想史和人们的社会政治活动史上，振幅，请读者原谅我用这个力学名词，反动的振幅通常等于正动的振幅。在思想方面，“改良主义”是一种肤浅的、贫乏的和可以说是毫无价值的现象。“工团主义”也是同样的贫乏、肤浅、毫无价值。在这种场合，反动的振幅并不比正动的振幅大。所以我要问一问：具有我刚才指出的那些特点的现象能不能叫做健康的现象呢？我想最好是不把它叫做健康，而叫做病态。工团主义者叫嚷得比改良主义者多得无法比拟。虽然改良主义者的叫嚷也并不少。不过叫嚷与叫嚷各不相同：现在西欧某些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发出的叫嚷，并不证明他们的思想是健康的，而是证明他们的思想得了贫血症。这也就是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认为“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们”用来同改良主义作斗争的“批判的武器”在我们心目中可能具有多少高贵的价值的那个意见所以大错特错的原因。的确，这柄武器“值得我

们深切的注意”。不过它之所以值得注意，正如改良主义“杰出的理论家们”用来反对马克思的那个“批判的武器”值得注意一样：我们应当使无产阶级认真地注意这两种“武器”，以便向他们说明，这两件东西多么糟糕、多么陈旧，如果拿来使用对他们又是多么有害。然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对这个问题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郑重其事地拿起“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们磨快的批判”武器，他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和最最可悲的错误，也就在这里。

当我想到这个可悲的错误时，我回忆起圣贝尔纳评论那些企图证明某些多神教哲学家是基督徒的中世纪思想家的意见。圣贝尔纳对他们说：“你们所证明的并非他们是基督徒，而是你们是多神教徒。”对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说来也是如此：他对“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们磨快的批判的武器”敬而重之的态度，只是使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那柄“批判的武器”情况不妙。

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另一个也是很大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同第一个错误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它之属于第一个错误就象种之属于属一样——在于他认为阿·拉布里奥拉是一个杰出的和独创的作家。他如此敬重自己的作者，甚至当后者明摆着在胡说八道的时候，他也不直截了当地驳斥他，而是“冒昧地表示”自己相反的、有时还是同样十分荒诞的意见。他坚信，猫儿是强大的野兽。其实猫儿只是在同老鼠斗争时才是强大的。而老鼠本来就是十分渺小的兽类啊！

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他的被他当作很大野兽的工团主义猫儿面前卑躬屈膝到何等可笑的地步，他的跋文中下面一段话可以说明：

“我们的作者把未来描绘成有许多独立的合作社的社会，这些合作社互相贸易往来，甚至还使用货币。那么，市场上不排除任何价格波动、任何生产过剩么？还有可能使一些人发财致富，使

另一些人一贫如洗么？一些经营合理和安排得当的合作社不会在短期内变成贵族式的合作社，而另一些则变成附庸的和受剥削的合作社么？哪里有市场、冒险行为，那里就不可避免地有领先地位，而如果没有国家，就不可能用公平的租金来调节甚至象地理布局、土地资源等等那样一些无限有利的条件。很难设想有一种空想会比集体主义的空想，比没有调节和计划中心的蒲鲁东式的半社会主义的空想更加明显地倒退到使社会分裂为阶级。不过，对‘权力’的恐惧使得无政府主义这个受惊的乌鸦甚至害怕灌木林^①。而其实，我们这位有才情的作者同受惊的乌鸦们一点亲戚关系也没有！”（第264页）

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确信，他的“有才情的”作者跟无政府主义这只受惊的乌鸦没有丝毫的共同点。他大大错了：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本人就断然说，他的同志们“跟无政府主义者在最终目的上几乎完全相似，尽管他们的实际措施有深刻的分歧。”（第108页注释）凡是认真阅读阿·拉布里奥拉的书的人都会相信，这位“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身上受过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最强烈的影响。诚然，这影响与其说是直接的，倒不如说是间接的。看来它主要是通过法国著作家乔·索雷尔^②的媒介，即通过《Introduction à l'économie moderne》^③一书和其他许多有着惊人的概念混乱的著作的作者的媒介。不过阿·拉布里奥拉的世界观不光是在蒲鲁东间接或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意大利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庞塔勒奥尼对它也助过一臂之力。假若我没记错，阿·拉布里奥拉甚至把

① 同汉语中“惊弓之鸟伤曲木”的意思相当。——译者注

② 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国社会学家，工团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受蒲鲁东、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影响，企图折衷地将蒲鲁东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他的观点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者有某种影响。代表作是《暴力论》。——译者注

③ 《现代经济引论》。——译者注

自己的一部著作献给了这位教授。庞塔勒奥尼可以称之为当代意大利曼彻斯特派一位最典型最光辉的代表人物。他是任何国家干涉的坚决反对者。所以难怪身上受过此人影响的阿·拉布里奥拉在说明他所谓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的观点时写道：

“他们根本不希望加强这个（即资产阶级。——格·瓦·）国家^①的势力，让它掌握新的压制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工具（国家干涉制度、大工业国有化等等），恰好相反，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个势力压缩到尽可能的最小限度”（第107和108页）。

还说：“他们只有到工人阶级得以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那一天才能开始搞正面的社会主义的立法”（第108页）。

不言而喻，“社会主义”立法只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有，至于“国家干涉”制度，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它不但现在可以有益于工人阶级，简直还是工人阶级所必需的。试拿所谓工厂立法为例。大家知道，马克思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称为劳动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胜利。不过庞塔勒奥尼教授自然是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这个问题的，所以在他的影响下，阿·拉布里奥拉说：

“古典式的反动运动的典型，我们可以在教权制社会那里看到，这个社会竭力想把反对派分子曾经成功地从它手中夺过去的权力捞回来。不过，有些政党力求把失去了的、或者从国家那里夺去的不仅监督个人意见而且监督社会经济生活的权利，重新交到国家手中，它们也是同样反动的”（第84页）。无庸争辩，有觉悟的工人阶级代表过去和将来都始终是对意见搞任何监督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然而对社会经济生活却不得不说，有“监督”，也有监督。

① 俄译本用的不是“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这个词，而是“统治”（господство）。不过这显然是排字错误，或者是翻译者的笔误。意大利原文印着：“di questo stato”（据1906年第二版核对）。

马克思认为上述十小时法案是重大的“原则胜利”，因为它意味着社会对现时靠盲目经济力量的自发作用调节的经济生活进行自觉的干涉。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宣布这样一种干涉乃是爱好自由的人不能容忍的国家监督的胜利。谁对了呢？马克思，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拉布里奥拉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至少没有象我这样地提出这个问题。可是，根据他对任何国家干涉都持纯粹曼彻斯特派的敌视态度来看，应当说，假使他想合乎逻辑的话，在这场争论中他的全部同情应该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一边。也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才可以在自己的书的结尾一章中声称：“在改良主义者的活动和革命之间没有任何其他的相互关系”（第242页）。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改良和革命的关系问题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阿·拉布里奥拉之所以害怕任何国家干涉，也正是因为他本人一则同无政府主义这只“受惊的乌鸦”是亲戚，二则也同——我想这样来说，以便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动物学比喻的领地上逗留一会儿——自由主义曼彻斯特派饶舌的喜鹊是亲戚。而我们可爱的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却料不到这一点；他至今还指望开导自己的“有才情的”作者，说什么好象他这位“有才情的”工团主义者压根儿不是“乌鸦们”的亲戚。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真是瞎子摸象！

他瞎子摸象也不是只此一遭，而是许多次了。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叙说阿·拉布里奥拉所“描绘”的那个未来时完全没有猜到，他这里恰好是碰着了“革命的”工团主义那个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一方面使“革命的”工团主义根本不同于我们当代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工团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取得经济解放的手段完全无能为力。

为什么“我们的作者把未来描绘成有许多独立的合作社的社会，这些合作社互相贸易往来，甚至同时还使用货币”呢？那正是

因为——也仅仅因为——他是一个“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看来，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工会应当成为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主要的工具。工会怎样才能消灭这些关系呢？一首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之歌早就邀请

Ouvrier, prends la machine,

Prends la terre, paysan!①

每一个工会都控制着与其职业相应的生产手段：铁路工会“掌握”铁路，掘墓工人“掌握”坟地和所有挖墓时要用的工具。于是两个工会彼此就铁路员工据以把死尸运走、而掘墓工人据以埋葬铁路员工的那些条件缔结“契约”。当然，不止掘墓工人和铁路员工这么干：一切劳动部门的生产者都这样干。而由于一切劳动部门的生产者都这样干，就发生了一件卢那察尔斯基先生不那么欢喜的事情：“市场上不排除任何价格波动、任何生产过剩；还有可能使一些人发财致富，使另一些人一贫如洗”，而“一些经营合理和安排得当的合作社在短期内”就“变成贵族式的，另一些则变成附庸的和受剥削的”。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说得完全正确：这会“明显地”倒退到使社会分裂为阶级。不过当他以为，好象阿·拉布里奥拉无需背叛自己，即背叛他这位我们最可爱的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如此不合时宜地恭维奉承的那个“革命的”工团主义就能放弃这个空想的时候，他就根本不对了。这个空想乃是“革命的”工团主义全部本质之所在。放弃这个空想无异于叫阿·拉布里奥拉不再做一个“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即不再是他自己。而因为“革命的”工团主义的空想无疑是资产阶级的空想，是奋起反抗国家的商品生产者的空想，所以放弃这个空想对于“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来说，简直就

① 工人夺取机器，
农人夺取田地。——译者注

意味着同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妥协，亦即意味着用未来的资产阶级诗篇来代替现在的资产阶级散文。这一点，“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是永远也做不到的。据我所知，他们根本没有自杀的兴致。

二

因为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对“革命的”工团主义学说本质的想象显然太糟，所以我劝他仔细地想想他那位“杰出的”阿·拉布里奥拉写下的这样一段话：

“工人应当斗争，让那种从工团生活的需要中产生的平等形式在世界上成为事实。他们应当使生活采取仅仅是工团主义的那种形式，即采取人们在有技术参与经济生产的基础上的纯粹契约组织的形式”（第20页）。按照阿·拉布里奥拉的意见，契约观念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请问：我们这位“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是从哪里弄来这个观念的呢？答：他是在蒲鲁东那里弄来的，——我不知道是直接弄来的还是通过索雷尔的媒介弄来的。不管怎么样，我都请读者直接请教蒲鲁东。下面就是后者说的话：

“契约观念排斥统治观念……对于契约，对于互相协商说来，其特点是由于这种协商可以扩大人们的自由和幸福，然而随着权力的建立，自由和幸福就都减少了……如果契约在其通常的意义上和在其日常的实践中具有这样的特性，那末以平等的利益把一个民族的成员互相联合起来的社会契约又是怎样的呢？

“社会契约是最崇高的证书，凭着这个证书每一个公民都让社会来支配自己的爱、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劳动、自己的服务、自己的产品、自己的财产，以换取自己邻人的牺牲、思想、劳动、产品、服务和财产，同时每一个人的权利的大小取决于他所缴纳的价值，而依所交纳的数量可以自由偿还……社会契约应当经过所有参加这一契约的人的自由讨论，个人同意和亲笔（“manupropria”）签

字……社会契约按其性质说来很象交换契约：社会契约不仅在它签字以后把签订者的全部（“l'intégralité”）财富保留下来，而且还增加他的财产；它不对他的劳动作任何命令，它只涉及交换关系……按照权利和普遍实践的规定，社会契约就应当是这样的。”①

摘录得很长，为此我向读者致歉。不过我必得这样做，为的是表明：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想拿蒲鲁东吓唬阿·拉布里奥拉，是何等天真。要有这么样的天真，就得既根本不了解蒲鲁东，也根本不了解阿·拉布里奥拉！

现在，当我们知道了阿·拉布里奥拉从何处弄来他的契约观念，且来看看这个观念本来是什么一回事。在这里，再让我翻开我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经济领域中把商品生产者互相结合起来的唯一纽带就是交换。——我在那里说道，——从法律的观点看来，交换是两个人的‘自由意志’的相互关系。它用契约来表现。因此按照科学的一切规则‘建立起来的’商品生产乃是‘绝对的’个人自由的统治，因为当用契约使自己接受生产某种物品和交换某种商品的义务的时候，我丝毫也不会限制自己的自由。根本不会！我利用这种自由同我的邻人们发生关系。同时契约会调节我的自由：因为当我履行我在签订契约时自愿承担的义务时，我就给其他人以应有的权利。于是，‘绝对’自由就变成恰当的‘秩序’”。（同一页）②我早已说过：阿·拉布里奥拉象浮士德一样有两个灵魂：一个灵魂来自

① «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十九世纪革命的普遍观念》]，1851年巴黎第十二版，第124—127页。这段话是从我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37页上摘引下来的[见中文版第51页。——译者注]，该书由恩·伊宁先生译为俄文，姆·玛丽女士出版。

② 参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文版第50页。——译者注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另一个来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庞塔勒奥尼。当他哇啦哇啦地反对国家干涉社会经济生活时，就是庞塔勒奥尼用他的嘴说话；而当他坚持契约观念时，就是蒲鲁东的精神在鼓舞他，也就是他自己在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是这样描绘“工人世界的理想”的：

“……这是唯一地和单纯地组织为各种物质生产形态的经济社会，这个社会里没有纯粹技术意义的任何等级制度都是不存在的，这个社会没有国家，没有监狱、军队和法律，它是根据经济需要、契约联系和对生产的技术指导同样牢固地和关心地组织起来的”（第20页）。

“没有法律”的社会，这不是工人世界的理想，而只是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这个理想建立在明显的误解的基础上。无政府主义者把契约同法律对立起来。然而这种对立甚至经不起最轻微的批判。

契约是公民间的协定，订了协定，人们就承担了一定的义务。靠什么来保证这些义务的执行呢？不是靠别的，正是靠法律。由此得出，契约并不排斥法律，而是以法律为前提。早就有人说过：“法若不行，枉为立法。”有同样权利可以说：“如果没有保证执行契约的那些法律，缔结契约就是白费力气”。在这种场合，契约的执行取决于每一个缔约者的裁定，因之也取决于缔约者每一方的任性。然而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按照任性来组织。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即使把契约观念当作社会组织的基础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该懂得，“没有法律的社会”乃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圆的正方形，荒诞不经。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比方美国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特凯尔，就懂得这个道理。特凯尔认为，必须有这种法律规范，这些法规可能建立在普遍意志的基础上，它们可能是由被社会承认为合理的一切手段强制执行的。顺便说说，这些手段甚至

包括监狱、死刑和……拷问^①！自称为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不但根本不愿意听到监狱和拷问，这自然是他们的荣耀，而且也根本不想听到讲法律，这一点，正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却丝毫不会使他们光采，因为这只是证明他们完全不讲逻辑。

肯定没有法律的社会是百分之百的胡说八道，这完全不是说任何法律都是好的。决不是的！法律可以有**好**有**坏**，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样明白的是：任何一个达到自我意识的社会阶级，即任何一个力求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造社会的阶级，都应当力求取消它认为**坏**的法律，而建立它认为**好**的法律。宣布任何法律，正因为是法律，所以是**坏**的，无异于宣布任何理想（也包括工人的理想）的实现都是**坏**的，这真是岂有此理的混账话。

事实上可以认为，工人阶级取得了权力以后，就会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必需做什么呢？颁定一条法律，宣布生产资料为公有财产，或者至少起初宣布一部分生产资料为公有财产。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早已告诉我们，实现阿·拉布里奥拉反共产主义的空想会把社会拖回到阶级分裂的状态中去。

那么“常备军”呢？“等级制”呢？“监狱”呢？“拷问”呢？要知道“拷问”不止在无政府主义者特凯尔的乌托邦中才存在哩。所有这些都是一片罪恶之海。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试试用“契约”这个勺子去舀干这片海洋吧！任何关于这个罪恶之海的思想都是“托尔斯泰学说”，“不以暴力抗恶”的同义语。为了消灭社会上的罪恶必需有法律。法律应当是社会意志的表现。如果现在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没有表现社会的意志，那么这原因就在社会分成了阶级。消灭了阶级划分，法律便不仅会成为整个社会意志的表

^① 关于这一点，请看艾里茨巴赫尔《无政府主义》一书，柏林，第225页。

现，而且还会是社会单个成员的自由的最佳保证。

阿·拉布里奥拉的“准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只有那种根本不考虑逻辑规律的人，或者只有那种事实上根本不追求任何“理想”、唯独欣赏震天价响然而毫无实际内容的夸夸其谈的那种人，才会觉得是有诱惑力的和能够实现的。我看，阿·拉布里奥拉正是这样一个满足于高谈阔论的人物，在他身上，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存在着两个灵魂。

三

阿·拉布里奥拉继续说道：“资产阶级社会把这种工团主义组织形式同人们的政治组织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使人们从属于站在直接的市民社会之外的机关，即从属于国家。只要稍微想一想这个对比，我们马上就会明白：索雷尔说得多么对，他断言，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权力即国家，和劳动人民的技术—经济组织即工团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第20页）。

工团，以及一般说来工人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建立的“政治组织”进行斗争，这是众所周知的和不言自明的。不过弄清楚这个斗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很有益的。阿·拉布里奥拉把事情说成是：工人的工团组织应当消灭“人们的政治组织”。他在自己著作的第191页上说道：“工团将完全取代国家。”然而情况根本不会这样。

自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灭，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也会消灭。恩格斯下面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它把社会统一为一个有形的组织，但是，说国家起这个作用，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本身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